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七

歌吟二十八首

襄陽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襄陽歌宋隋王誕作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

章培恒 / 骆玉明

主编

中國文學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

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

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王贊曰已上事並見五卷襄陽曲注

鷓鴣

杓鷓鴣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

杯

齊賢曰鷓鴣水鳥也其頸長刻杓為之形

山海經黃山有鳥其形如鷓鴣青羽赤喙人云能言名鷓鴣鏤杯為之形今人以海螺造

章培恒 / 骆玉明 主编

中國文學史

中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概 说	3
第一章 隋与初唐诗歌	17
第一节 隋代诗歌	18
第二节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22
第三节 初唐四杰的崛起	27
第四节 陈子昂	34
第二章 盛唐诗歌与李白	43
第一节 张说 张九龄	43
第二节 孟浩然 王维	48
第三节 王昌龄 李颀	60
第四节 高适 岑参	71
第五节 李白	81
第三章 杜甫与中唐诗歌	101

第一节	杜甫	102
第二节	大历、贞元间诗人	122
第三节	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	134
第四节	元稹、白居易与新题乐府诗	154
第五节	刘禹锡 柳宗元	173
第四章	古文运动	183
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兴起	185
第二节	韩愈与古文运动	188
第三节	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198
第五章	唐代的小说与讲唱文学	207
第一节	唐传奇的兴起	207
第二节	唐传奇的发展过程	211
第三节	唐传奇的地位和影响	225
第四节	唐代话本小说	226
第五节	讲经文与变文	228
第六节	词文和俗赋	233
第六章	晚唐诗文	235
第一节	杜牧与许浑	237
第二节	李商隐	242
第三节	晚唐前期的其他诗人	250
第四节	晚唐后期诗文的演变	253
第七章	唐五代词	265
第一节	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	265
第二节	唐代文人词的创作	270
第三节	西蜀词人	276

第四节 南唐词人与李煜·····	280
------------------	-----

第五编 宋代文学

概 说·····	291
第一章 北宋初期文学 ·····	309
第一节 北宋初期诗歌的三大流派·····	310
第二节 北宋初期的词·····	319
第三节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321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	327
第一节 道统文学观的盛张·····	329
第二节 梅尧臣、苏舜钦的诗·····	331
第三节 欧阳修与诗文变革的完成·····	340
第四节 王安石·····	348
第五节 北宋中期的词·····	353
第六节 苏轼·····	367
第三章 北宋后期文学 ·····	389
第一节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390
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词·····	401
第四章 南宋初期文学 ·····	411
第一节 陈与义、曾幾等人的诗歌·····	412
第二节 南宋初期的词·····	417
第三节 李清照·····	422
第五章 南宋中期文学 ·····	429

第一节	杨万里与范成大·····	431
第二节	陆游·····	439
第三节	辛弃疾·····	451
第四节	辛弃疾周围的词人·····	462
第五节	朱熹的文论·····	464
第六章	南宋后期文学 ·····	469
第一节	南宋后期词人·····	471
第二节	江湖诗人·····	481
第三节	严羽的《沧浪诗话》·····	487
第四节	文天祥及宋元之际的诗人·····	489
第七章	辽金文学的发展 ·····	495
第一节	辽的文学·····	496
第二节	金诗词与元好问·····	503
第三节	《西厢记诸宫调》·····	517

第 四 编

隋 唐 五 代 文 学

概 说

公元五八一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此前长江以北及西南地区已为周武帝所统一。隋的疆域广大，势力壮盛。而与之对峙的陈朝，较之它以前的南朝任何一个朝代的版图都缩小得多，陈后主君臣又懦弱无能。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造成了在分裂长达三百多年的中国重新实现统一的时机。五八九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

犹如短暂的秦王朝为汉王朝的长期统一作了准备，隋王朝再次充当了仅仅是前驱的角色。隋文帝死后，隋炀帝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便滥用民力，以满足其享乐的欲望和开边的雄心，激起全国的大反抗。公元六一八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此基础上建立唐朝，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繁盛的时代。

隋王朝的迅速崩溃，也如秦亡之于汉，给予唐王朝统治者以极大的教训。作为开国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心胸开阔、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执政以后，“以史为

鉴”，以谨慎而又果敢的态度，很快调整了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并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广大农民的处境，恢复和发展生产。其后经过高宗、武则天时代直到玄宗前期，唐立国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大体保持着上升的势头，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成为史家的美谈。贞观时有斗米仅值三四钱的记录；开元时，杜甫《忆昔》诗描述为“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这些都反映出农业发展的情况。手工业方面，织锦、造纸、陶瓷、金属制品的水平，都有显著提高。印刷技术，也开始在佛经的传播中得到广泛使用。经济实力的增长，支撑了雄厚的军事力量，唐朝的疆域大幅度向外开拓。由唐朝沿边所设六都护府的情况来看，其势力范围，北至蒙古，东部、西部和南部已分别达到朝鲜半岛、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印度支那的部分地区，是中国有史以来，也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国力最为强盛的政权。

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变化了的基础上，唐代社会形成一系列新的特点。

首先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崛起。尽管在南北对峙中，南方政权作为最后的失败者，被记录下大量劣迹，但应该注意到：经过南朝多年的开发，江南成为全国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这种生产力的重大发展，是不可否定的。而且，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并不等同于经济上文化上的优势。在唐朝历史上，江南始终是全国经济的支柱；来自东南的“漕运”，成为维持中央政权的命脉。同时，南方文化也以有力的势头北上，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南朝文学成为隋唐五代文学的主要基础。

在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中原地区，已有数百年的历

史。这些少数民族虽然还各自保存了一些传统习俗,但汉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在这时,才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建立起多民族融合的统治。李唐皇室原本与鲜卑贵族有极深的关系(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均是鲜卑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更需要打破狭隘的所谓“夷夏之别”。李世民作为唐朝的皇帝,又被尊称为西北诸民族的“天可汗”。他自述成功的原因,其一就是能够平等地对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士。而在唐政权中,由“胡人”担任高级将领、地方长官乃至宰相,是很平常的现象。这进一步加快了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强大而具有恢宏气度的唐代社会,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也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心和开放性。一方面,唐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大国,它的文化通过大量涌入的各国使者、留学生、商人传播到境外,并且在中国周边形成一个更大的汉文化圈(日本文化的汉化是特出的例子);另一方面,唐人也通过这些外来者,通过本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远出取经的高僧,大量吸收异域的文化。宗教方面,不但佛教有新的发展,祆教、摩尼教、回教也进入中土;中国传统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乃至日常服饰、饮食,都因为接受异民族文化的影响,发生重大改变。爱好外来文化,甚至成为社会的时尚;胡酒、胡乐、胡舞、胡服,成为值得炫耀的东西。

总之,南北文化、国内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汇聚,相互融合,推陈出新,使得唐代文化呈现出生气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面貌。

唐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作为贵族阶

层的士族享有充分的特权,也不同于宋代以后的王朝,士族完全不复存在,而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绝对中心,它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隋唐以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豪门大族的势力都很强大。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唐人柳芳甚至认为这是导致隋亡国的重要原因(《氏族论》)。唐太宗执政不久,即下令修《氏族志》,这是在全国统一以后对各利益集团关系的调整。经唐太宗授意,皇族和外戚被列于《氏族志》的最高地位,而后才是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同时还把原先非士族的功臣以及其他一些新起的族姓列入谱内。这既承认了原有士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强调了皇家的尊贵,并扩大了政权的基础。旧门阀势力在唐代受到压抑,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如唐朝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中,出于崔一姓的有二十三人^①,就可见一斑。

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新的选拔官员的途径,在唐代得到继承。它作为朝廷主持的考试,取代了过去由士族把持的铨选,促进了中央集权。但唐代的科举与宋以后的科举有很大区别。参与科举者,部分来自各级学校,大抵为官员子弟;其他人要经过地方上的“选贡”,士庶之分虽非“选贡”的依据,但作为一种划分社会阶层的手段,它对“选贡”必然会有相当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卷评阅是不糊名的,及第与否,考生的家庭地位、社会影响、考官对其熟悉程度等因素大有

① 此条及下文范阳卢氏中进士人数均据岑仲勉《隋唐史》。

关系。因此总体说来,新旧士族在科举中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如范阳卢氏自德宗兴元元年至僖宗乾符二年约九十年间,有一百十六人登进士第,便是显著的例子。

另外,科举在唐代政治结构中的意义也不像宋代以后那样重要。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数不是很多,还有许多官员是通过其他途径简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门资”(家庭的政治地位)入仕,这也是一种贵族特权。

在上一编中,我们已经说明:贵族政治特权的存在,对于普通人士固然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但同时它也有抑制皇权绝对化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专制统治有所松懈,使个性尊严、个人自由的思想有存在的空间。像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在魏晋南北朝并不是罕见的事情——范曄甚至一定要等皇帝亲自唱歌时,才肯为他弹琵琶。对于唐代政治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拿唐朝和宋朝相比,由于皇权强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唐代的情况又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社会。《氏族志》所列已比旧门阀士族的范围扩大了许多,高宗时代武则天执政,又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使“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旧唐书·李义府传》),进一步以朝廷“功名”破坏士族制度,士庶的界限不断淡化。在科举中,虽然存在士族占优势的情况,但毕竟为许多普通读书人提供了机会。至于像马周受唐太宗的欣赏,由布衣直接拔擢为宰相,这在南北朝士族社会里更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总而言之,唐代社会既有一定的贵族化色彩,同时对社会中下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容纳他们之中的优异人物。

这使得许多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文人,对于个人前途抱有更大的信心,对参与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活动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唐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些特别。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或佛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学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复兴。科举中所考的“帖经”,只是简单的记诵默写,而不是对其思想的阐发;唐代对儒学的学术性研究,甚至还不及南朝;唐代以昌盛儒学为己任的韩愈等人,在宋代一些儒者(特别是理学家)看来仍然是驳杂不纯的。

这种情况,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特征。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中儒学衰弱,多种思想并存,这种局面不是短时期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唐代社会的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不是单一的,政治上也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利益集团,要建立单一的思想统治那就缺乏必要的基础了。所以,唐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较为自由活泼。

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标志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巨变。这一场争夺最高权力的叛乱与平叛的战争,打了八年之久,使社会遭到巨大破坏,也使唐王朝的中央政权

大伤元气。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出现中央所不能控制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虽然有宪宗时的“中兴”,中央政权有所加强,但这种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一直延续到唐亡。唐中后期另一个重大的政治困境,则是宦官擅权。任用宦官,实际自太宗起已经兆萌,只是未失去控制而已。中唐以后,皇帝既不能相信在外的军事将领,又不能充分相信在朝廷中的官僚,只能循汉代的老路,把权力甚至兵权托付给作为家奴的宦官。其结果,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宦官之祸。连皇帝的生死废立之权,都经常地落在了宦官手里。而在官僚集团中,晚唐又出现党派之争,最著名的即所谓“牛李党争”。在多重危机中,这个辉煌一时的帝国,终于走向了衰颓,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它的崩溃已不可避免。此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实际是藩镇割据的延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衰落的中晚唐,社会的经济文化并不是完全停顿了下来。东南一带的经济,仍在局部的安宁中发展着,扬州、苏州、杭州以及广州、成都等城市,由于受战乱的影响较小,甚至比初盛唐时期更为繁荣。由于社会面临着复杂的问题,迫使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在动乱和危机中保持着活跃的生机。

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组成的多元化,思想统治的相对宽松,以及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以诗赋为主要的考试内容等各方面的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结下累累硕果,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唐

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关于唐诗与前代即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关系,存在一些需要说明和澄清的问题。

在上一编的《概说》中,我们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成就及特点和主要弊病及缺陷,已经作了扼要的说明。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诗歌为后代诗歌的发展,打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唐代诗歌,正是通过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扬弃、发展而推陈出新,达到新的高峰。但是,唐代文学批评,大多对前代(尤其是南朝)文学,采取从整体上加以否定的态度,使得两者之间在延续中变革、在变革中延续的关系,成了似乎是对立的关系;而后代的文学批评,也大多接受了唐人的观点,甚至变本加厉,这就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唐人否定前代文学,大抵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文学发展本身的需要,而对前代文学风气(尤其它的偏颇和缺陷),采取矫枉过正的态度。这种否定虽有必然和合理的一面,但不一定是全面的;其二,作为一个新建立的王朝,需要在理论上对前代文化加以通盘否定,以昭示“圣朝”的光明。但其意义主要是在政治上,实际未必照此实行;其三,唐代始终存在复兴儒学的呼声,尽管实际效果不大,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也有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确实重新抬起了。这并不是什么进步的现象。总之,对唐诗的情况,对唐诗与前代诗歌的关系,不能完全听信唐人自己的宣言,而必须从他们的实际创作中寻找结论。譬如李白的《古风》第一首,认为《诗经》以后的文学一直处于衰微的过程中,

“自从建安来”，更是“绮丽不足珍”^①，直到“圣代复元古”，文运才得以重兴。虽然诗中也略有可取的意见，但总体上只是儒家文学观的陈词滥调。有趣的倒是：这种理论观念上的表述，同初盛唐诗人包括李白自身的创作实践，根本是不相符的，李白恰恰是集六朝诗歌之大成而翻新出奇的诗人。

客观地分析，唐代诗歌的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主导力量的改变。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士族社会，诗歌创作，主要产生于宫廷和高级士族这两个圈子。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出身低微的诗人，但他们往往依附于前者，影响也有限。唐代的情况则不同，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大，不但帝王和高级官僚参与其中，大量中下级官僚以及普通士人，乃至和尚、道士、妓女等各种身份的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们，也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初唐后半阶段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杰出成就、对诗歌创作的潮流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到李白、杜甫，以及李贺、李商隐等人，大都家庭出身并不显赫，本人的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些著名诗人如王维、白居易，虽然晚年仕宦显达，但他们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说，诗歌创作在唐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点对唐诗特点的形成以及创作数量的大幅度增

^①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二句，或解释为肯定建安而否定建安以后，但无论全诗的逻辑还是这两句诗的语法，都清清楚楚，不可能得出上述结论。